

20世纪以来大运河水利史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卢勇 冯培

(南京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大运河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水利工程之一,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唐宋以后,在政治中心北移、经济中心南移的背景下,大运河成为沟通南北经济政治文化的水陆轴心,延续民族大融合、国家大一统的内生纽带。大运河兴衰直接影响国家漕运与粮食安全,历代均将其视为国家经济命脉与政治生命线。清末叶以后,黄河北上,漕运废止,大运河研究却渐成显学。尤其是20世纪以来,大运河水利史研究成果颇丰。但多数研究者从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出发,缺乏辩证统一的人—水整体论意识,致使研究面临诸多困境。因此今后的研究中,应注重多元史料的搜集与文本的深层阐释,确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实证研究范式。从运河本体、人与运河、运河与社会三重维度出发,探讨河流修复、水体流通、生态涵养等新时期人—水互动的治理模式、生态意识与文化形态。

【关键词】大运河;20世纪以来;水利史;反思与前瞻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9)05-0134-11

Reflections and Prospects on the Study of the Grand Canal Water Conservancy History since the 20th Century

LU Yong FENG Pei

(The Chinese Agri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Center,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Abstract: The Grand Canal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Chinese history and also is a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recognized by UNESCO. After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orthward movement of the political center and the southward movement of the economic center, the Grand Canal became the water and land axis to communicate the economy, politics and culture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continuing the internal link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national unificatio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and Canal has a direct impact on national water transport and food security, which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lifeline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politics in past dynasties. After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en the Yellow River went north and the water transport was abolished, the study of the Grand Canal becam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Especially since the 20th century,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study of the Grand Canal's water conservancy history.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centrism, most researchers lack the dialectical and unified consciousness of human-water holism, which makes the research face many difficulties. Therefore, in future research,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llection of multiple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the deep interpretation of texts, and establish an empirical research paradigm combining

【收稿日期】2019-09-1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方志物产知识库构建及深度利用研究”(18ZDA327);2018年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江苏水利史”(6R0036)

【作者简介】卢勇(1978-),男,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教授,主要从事水利史及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冯培(1995-),女,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水利史及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Starting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canal itself, human and canal, canal and societ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governance mode, ecological ideology and cultural ideology of human-water interaction in the new period, such as river restoration, water circulation 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Key words: the Grand Canal; since the 20th century; water conservancy history; reflections and prospects

自元定鼎大都之后,国家之经济中心南移于江南,隋唐大运河已无法满足现实需求,为便于江南地区的财赋、粮秣供给京师,使南北交通贯通,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开凿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截弯取直,将此前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修筑成南起余杭、北达大都的纵向运河,元代修筑的这条运河为明清两代所沿袭,后世称之为京杭大运河(如图1),以下简称大运河^①。大运河作为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在元明清三代一直承担着输送漕粮、供养京师、沟通南北的重要使命,其作用和价值无可替代。清圣祖康熙曾言:“朕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靡念,曾书之宫中柱上”^②,现今漕运虽废,但大运河仍具有重要地位。

早在20世纪初期,便有学者将目光投注于大运河的研究。此后百年间,对大运河的相关研究颇受学术界关注^③。整体观之,前贤之研究内容纷繁博杂,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众多领域,对此进行梳理、总结,一来可厘清大运河水利史研究的发展脉络;二则能为今后大运河水利史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实现从人类中心主义向人—水整体论的范式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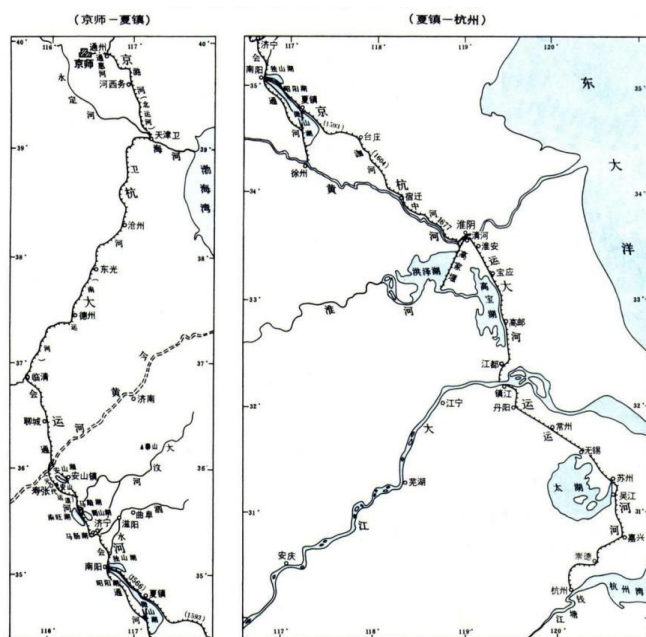


图1 明清京杭大运河形势图(京师—杭州)^④

① 2014年,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此项目中,大运河主要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大运河三部分。隋唐大运河的渠道多已湮没或成为京杭大运河的一部分;浙东大运河主要位于浙江境内,里程较短,可视为京杭大运河之附属。

② [清]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5《名臣》,清同治八年刊。

③ 王云在对上个世纪前中叶运河史研究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对1988至2001年十多年间的运河史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作了一些梳理(《近十年来运河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6期)。刘小花回顾了上个世纪及本世纪初关于运河史的研究成果,并对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研究方法、资料挖掘等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中国运河史研究综述》,《吉林水利》2007年第9期)。沈伟丽主要以里运河为研究对象,关于里运河的传统史料分析与社会现实性研究皆收录其中,较为详备(《里运河研究文献综述》,《文教资料》2010年第34期)。此外还有关于漕运的综述,如胡梦飞的《近十年来国内明清运河及漕运史研究综述(2003—2012)》(《近十年来国内明清运河及漕运史研究综述(2003—2012)》,《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和高元杰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漕运史研究综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1期)等研究成果不胜枚举。

④ 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2—223页。

一、大运河水利史研究发展历程

近代以来,自1919年出现第一篇专门研究大运河水利史的论文开始,此后百年间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大运河水利史的研究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明显的时代性特征,其主要发展历程约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兴起:1919年至1948年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运行了六百多年的漕运寿终正寝。随着漕运被废、铁路与海运兴起,大运河的交通地位虽一落千丈,但影响仍存,是故对大运河的研究初露端倪。1919年,张景贤《北运河考略》的发表开近代中国大运河水利史研究之先河^①,此后如汪胡桢^②、武同举^③、清水泰次^④和西山荣久^⑤等学者研究并发表了一些关于大运河的文章。这其中以史念海先生的《中国的运河》影响力最大,堪称近代中国首部研究运河的专著。该书从运河的变迁、发展来讨论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史,认为运河产生于社会的需要,对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巨大,而社会发展反作用于运河兴衰;此外,作者强调写此书是要为世所用,提出运河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亟应早日图谋恢复,这对今日复兴大运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⑥。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运河的变迁与沿革,也有少量研究漕运的文章,尚处于探索型研究阶段,但是作了大量有益性的开创工作,为深化今后对大运河水利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发展:1949年至1965年

新中国成立后,首都复奠于北京,党和政府面临与元明清三代相似之问题:如何更好地沟通南北、南粮北运,于是对大运河进行大规模整修,使其部分河段重新发挥航运、灌溉、排涝等多重功能。这一时期大运河重回人们视野,对大运河水利史的研究工作也有很大进展,一些期刊、杂志、报纸上均刊登关于大运河研究的文章,如谭其骧的《黄河与运河的变迁》^⑦、樊树志的《明清漕运述略》^⑧等。本时期研究大运河的专著也明显增多,主要有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的《东方专制主义——对于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于耀文的《漕运史话》、超华的《大运河的变迁》、台湾学者吴缉华的《明代的海运与运河的研究》等。此外,朱偰还对运河资料进行了整理与汇编,其《中国运河史料选辑》依托于治河人员的著作、正史、地方志和私人记载,按时间顺序对中国古代运河资料进行选辑,并附有历代运河起源图,是一部具有较高价值的水利史料汇编^⑨。

(三)曲折:1966年至1977年

这期间因为文革影响,大陆关于大运河水利史的研究一度停滞,但一些境外学者仍致力于此方面的研究,并有所突破。日本学者星斌夫在其著作《大运河——中国的漕运》介绍从先秦至清代大运河及漕运制度的发展状况,认为大运河是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反过来也极大地促进政治、经济与

① 张景贤:《北运河考略》,《地学杂志》1919年第9-10期。

② 汪胡桢:《运河之沿革》,《水利月刊》1935年第2期。

③ 武同举:《江北运河变迁史及其现状》,《江苏建设月刊》1935年第2期。

④ [日]清水泰次:《明代漕运》,《史学杂志》39编2号,1928年。

⑤ [日]西山荣久著,祁蕴璞译:《中国大运河沿革考》,《禹贡》1937年第10期。

⑥ 史念海:《中国的运河》,重庆史学书局,1944年。

⑦ 谭其骧:《黄河与运河的变迁》,《地理知识》1955年第8、9期。

⑧ 樊树志:《明清漕运述略》,《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

⑨ 朱偰:《中国运河史料选辑》,中华书局,1962年。

社会的发展^①。此外,中国台湾学者张哲郎的《清代的漕运》也对清代漕运的发展历程进行初步探索^②。概而言之,这一时期海外学者开始关注水利与国家、社会间的关系,研究方法与研究视野较前期有所拓展,而大陆学者囿于时局对于大运河水利史的研究进展迟缓,资料散佚严重,国际交流缺乏,这也导致改革开放初期的相关研究一度明显落后于国际前沿。

(四)成熟:1978年至今

改革开放后,大运河与大运河水利史研究一并重新焕发新生。2002年大运河被纳入了“南水北调”三线工程之一,2014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习总书记“大运河文化带”战略构想的提出,海内外再一次掀起了大运河研究的高潮。本时期逐渐朝研究内容广泛化、研究程度精细化方向发展,并出现了一些水平较高的大运河研究专著和资料汇编,如姚汉源的《京杭运河史》、陈璧显的《中国大运河史》、王云主编的《中国大运河历史文献集成》等。学术论文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论文既有专题型,亦有综述型;既有对大运河全段的研究,亦有对单段运河的研究;既有专文探索漕运者,亦有研究运河文化与沿河农业开发等。研究形式多样,内容也更加广泛。另外,随着国门日开,大运河水利史的国际交流更加密切,国外研究成果被大量引入,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如“东方专制主义”“水利社会”“公地悲剧”等也被国内学者运用于大运河水利史的研究之中,令人眼界顿开,目不暇接。除学术研究外,一些大运河研究机构也应运而生,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及南京农业大学农业文明分院、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大运河智库联盟、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等,都各有所长,成果迭涌。概之,这一时期的研究日臻丰富并架构已成,且有相关学术单位相依托,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余年的大运河水利史研究焕发出勃勃生命力。

纵观百年来大运河水利史的研究历程,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时代变迁,大运河水利史的研究经历从无到有,从初步探索到精细化、专题化研究的发展历程。其百年之路虽然曲折,但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螺旋前进,截至目前,大运河水利史的整体研究体系已初步成型,纲目并举,但仍有相当可完善的空间。

二、大运河水利史相关专题研究

大运河水利史主要以运河发展变迁及对其周边环境影响为研究对象,相关研究内容纷繁博杂,经条辨缕析、爬梳整理众多研究成果后,归纳出学界关于大运河水利史的研究大体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黄、淮、运关系研究

元明清时期,黄河南下夺淮,黄淮并体,运借黄道,此间黄淮运三者交织,研究其中一者,便无法规避另外二者,因而许多学者将目光转向了三者关系的研究上。如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编写的《淮河水利简史》虽主要论述淮河水利史,但对于金代黄河夺淮入海以后的这段历史,则将侧重点放在了黄、淮、运三者的关系上,对研究运河与黄淮关系发展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③。邹逸麟主编的《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论述了大运河产生的原因及影响,并提出了对运河历史变迁的几点认识,尤其指出运河的发展与黄河变迁密不可分^④。曹志敏同样认为明清时期为通运转漕而实施的一系列措施违背了河流本性,加大了黄河的治理难度,影响了黄河的治理效果^⑤。牛建强在文章中细致勾勒了明代黄河治理中治河与漕运的矛盾,指出漕运是严重干扰本时期黄河治理的重要人为因素^⑥。

① [日]星斌夫:《大运河——中国的漕运》,(东京)近藤出版社,1971年。

② 张哲郎:《清代的漕运》,台湾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赞助印行,1969年。

③ 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淮河水利简史》,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年。

④ 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

⑤ 曹志敏:《清代黄河河患加剧与通运转漕之关系探析》,《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⑥ 牛建强:《明代黄河下游的河道治理与河神信仰》,《史学月刊》2011年第9期。

姚汉源说:“黄河、淮水与运河交叉重叠,因而防干扰,讲利用,治运不能不顾及治黄、治淮等综合治理问题”^①。自古以来,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说,对大运河的冲击影响极大。自咸丰年间黄河改道北上之后,虽无大规模改道之大患,但隐忧仍在,黄、淮治理一直是新中国水利事业的重点对象。学界通过对历史上三者关系的研究,厘清了其间的脉络纠缠,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对于本时期黄淮运的治理,以及今日之开发利用等意义极大,引一时之风潮。

(二)大运河管治研究

明清时期,由于黄河主要自西而东,以入黄海,大运河由南向北输送漕粮,黄运交叉无法避免,因而大运河常受黄河泛滥影响致使运道损坏。为保漕运畅通,明清政府时常要对运河河道进行管理修治,这是明清两朝运河治理的重点所在,糜费之人力物力,不可胜计。

关于明代大运河的管治研究,邹逸麟以16世纪为界将明代治河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认为前后期治河思想和措施的不同是由保运、护陵的目的所决定的,并从明代刘天和《问水集》、万恭《治水筌蹄》、潘季驯《河防一览》三部治河专书中分析出治理黄运思想从治水防洪、治河通运到河运合一、以河治河,再到筑堤束水、以水攻沙之脉络变迁^②。田冰从明代黄河水患与治黄保漕时空变迁关系的角度对明代前后期治河措施的变化进行分析,指出治黄保漕的重心与治水措施是随黄河水灾影响区域而变动的,但缺乏统筹考量,因而效果欠佳^③。另外,古为今用、以史为鉴计,历代一些水利专家的治运措施和思想,一直以来也是学者探究的重点。张含英的《历代治河方略探讨》一书的后半部分便大量论述了明清两朝主要治水大臣的治河思想与成败得失^④。展龙、吴志刚从人事政策、水利资金、河工夫役三个方面,论述了一代明相张居正在主政期间管理黄、淮、运及三吴水利所采取的措施,这些措施不仅保证了水利工程的顺利开展,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⑤。

关于清代大运河的管治研究,贾国静对清代河政体制进行了深入解析,通过对元明清三朝治河力度的比较分析,指出清代如此重视治河不仅是为保漕,也是为保证其政权的合法性,极具政治意蕴^⑥。彭安玉在对江苏境内长江至淮河段大运河的流向作细致梳理的基础上,指出唐宋以前,大运河江淮段由南向北流,明清时期,改为由北向南流,这是“借黄济运”政策的必然后果^⑦。清代帝王与大臣的治水思想和措施亦多受关注。如任重探讨康熙治理黄、淮、运的宏观决策与微观实践,指出其治水措施极大促进了农业发展^⑧。席会东考证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江南黄河图》的绘制年代、绘制者与绘制背景,厘清了康熙朝中期河督董安国、于成龙的治河史实,并在此基础上归纳了《江南黄河图》在康熙中期河工河政中的作用及其在清代河政史上的重要价值^⑨。

(三)大运河与漕运研究

① 姚汉源:《京杭运河史》,水利水电出版社,1998年,第124页。

② 邹逸麟:《明代治理黄运思想的变迁及其背景——读明代三部治河书体会》,《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③ 田冰:《明代黄河水患与治黄保漕时空变迁述论》,《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年第5期。

④ 张含英:《历代治河方略探讨》,水利电力出版社,1982年。

⑤ 展龙、吴志刚:《张居正主政时期水利事业的管理与运营——以黄、淮、运和三吴水利为中心》,《社会科学辑刊》2013年第3期。

⑥ 贾国静:《“治河即所以保漕”?——清代黄河治理的政治意蕴探析》,《历史研究》2018年第5期。

⑦ 彭安玉:《大运河江淮段流向的历史演变——兼论清代“借黄济运”政策的影响》,《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⑧ 任重:《康熙治理黄、淮、运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中国农史》1997年第1期。

⑨ 席会东:《河图、河患与河臣——台北故宫藏于成龙〈江南黄河图〉与康熙中期河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4辑。

漕运乃大运河诞生之缘由,也是千百年来大运河川流不息的使命所在。上起隋唐,下至明清,漕运制度大体一脉相承,渐进发展,因而研究大运河与漕运可管窥中国古代近千年的历史地理、税制演变、经贸往来等诸多历史动态,意义非凡,一直以来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

元明清三朝不断修治大运河用以运输漕粮,“廩官饷兵,一切仰给漕粮。是漕粮者,京师之命也”^①,大运河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关于大漕运的研究不胜枚举,涉及漕运政策法规、漕运管理、漕运贸易、漕粮征收运输等多方面。其中以漕运为主题的专著,如李治亭的《中国漕运史》、吴琦的《漕运与中国社会》、黄仁宇的《明代的漕运》、李文治和江太新的《清代漕运》等,皆为一时佳作。

关于漕运政策法规研究,吴欣梳理了明清漕运法规的发展历程,认为社会变革是影响漕规变化的核心因素,并指出漕规虽应时而变却未成规范,也因缺乏人性化而引发一系列弊端^②。王培华总结了元明清时期实行的南粮北运决策所造成的多种负面影响,包括环境恶化、民穷民困、南北社会思想对立等。对此,中央政府虽采取措施试图缓解矛盾,但这种矛盾始终与皇朝的兴衰相伴随^③。关于漕运管理研究,谢宏维、李奇飞分析了明代漕运总督的设置与沿革、职掌与权责、任职与管理等,揭示了其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与对清代之影响^④。陈喜波、邓辉详细介绍了明清漕运码头的功能设施、转运职能及转运规模等,在此基础上梳理了漕运码头与运河漕运和京通二仓之间的关系,强调通州漕运码头作为重要的运河文化遗产,应加强保护^⑤。关于漕运贸易研究,许檀研究了明清时期大运河商品流通的规模、内容、特点及地位,指出这对促进全国物资交流及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⑥。赵全鹏论述了明代漕运基建、漕粮征收、漕粮运输和漕粮仓储中的商业活动,强调漕运中的商业活动是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相分离的结果,而大运河两岸的商品经济也只是呈现虚假的繁荣^⑦。关于漕粮征收运输研究,鲍彦邦对明代漕银折征形式、原因及趋势进行了初步考察,指出漕银折征形式的改变反映了东南地区赋役沉重,漕运制度也正走向衰败,从而对明王朝的专制统治产生了严重影响^⑧。吴琦、肖丽红以清代抗粮事件为中心,揭示了官府、绅衿、民众在利益纠葛中的群体互动,以此透视出清代漕政的制度缺陷^⑨。

(四)大运河与城镇变迁研究

大运河作为纵贯南北的大动脉,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每一次的兴衰变化无不影响着沿岸城镇的发展。大运河的繁荣为其周边城镇带去了便捷的交通,漕运的兴盛也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吴小伦从河道变迁探讨明清清江浦镇的兴衰,指出明清时期清江浦镇依靠大运河带来的商品贸易,实行重商轻农的消费性发展模式实则是一种畸形的繁荣,难以维持一个城镇的长久繁荣^⑩。江太新通过漕运与淮安清代经济关系研究,探讨漕运兴衰对淮安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要总结经验,为今后运河城镇的发展提供了借鉴^⑪。

① [清]王心敬:《裕国便民备荒兼得之道》,《切问斋文钞》卷17,同治八年金陵钱氏刻本。

② 吴欣:《“通漕”与“变漕”——明清漕运法规变革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③ 王培华:《元明清时期的南北矛盾与国家协调——以南粮北运引发的南北区域对立和解决方案为线索》,《学术月刊》2010年第42卷。

④ 谢宏维、李奇飞:《明代漕运总督述论》,《史学月刊》2016年第10期。

⑤ 陈喜波、邓辉:《明清北京通州城漕运码头与运河漕运之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年第2辑。

⑥ 许檀:《明清时期运河的商品流通》,《历史档案》1992年第1期。

⑦ 赵全鹏:《明代漕运中的商业活动》,《史林》1996年第1期。

⑧ 鲍彦邦:《明代漕粮折征的数额、用途及影响》,《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⑨ 吴琦、肖丽红:《清代漕粮征派中的官府、绅衿、民众及其利益纠葛——以清代抗粮事件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2期。

⑩ 吴小伦:《河道变迁与明清清江浦镇的兴衰》,《山西档案》2014年第3期。

⑪ 江太新、苏金玉:《漕运与淮安清代经济》,《学海》2007年第2期。

大运河与其周边城镇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大运河在带来繁荣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周边城市造成了一系列危害。马俊亚从治水、漕运和盐务等方面对明清以来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的历程及原因作了深入研究,指出淮北地区从鱼米之乡变为穷乡僻壤是明清政府借“顾全大局”之名而牺牲局部地区利益的结果^①。王聪明、温瑞在文中指出明前期,大运河带给淮安府极为便捷的交通运输;而明中叶以后,为治理漕河,明廷实施一系列治水举措,进而直接导致了整个淮安城市体系的重组^②。

明清时期,在漕运、盐务以及过往商客消费的刺激下,大运河周边城镇成为“客商船集辐辏之处”,但受黄河水灾和大运河用水影响,大运河周边地区又大多农业萧条,因而形成了重商轻农的经济发展模式。但随着漕运衰落、铁路海运兴起,这种缺乏工业、农业支撑的畸形繁荣被打回原形,最终这些城镇在近代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衰落。因此,现代城市的发展也应引以为戒,尤其要“以文化为魂,以经济为基,以生态为要,文化、生态、经济三位一体”^③,才能再现大运河沿岸城镇文化自信、环境优美、经济昌盛的繁荣景象。

(五)大运河与农业开发研究

大运河虽专为漕运而开发,但作为一项水利工程,除了具有航运这一最为重要的职能外,对沿岸的农田水利亦是影响巨大。不仅促进沿岸经济作物的种植,而且加快商品流通,沟通了南北经济交流。如张照东通过整理清代漕运物资的数量与种类,指出在商品交换经济不太发达的情况下,运河漕路将各地沟通起来,漕运兴衰直接影响各地的经济联系^④。陈冬生论述了明清时期山东西部大运河流域经济作物的种植状况,该地区经济作物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并呈现专业化经营色彩,指出这是大运河加强南北经济交流的结果^⑤。

大运河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亦造成诸多危害。首先便是大运河水量与农业灌溉存在极大矛盾,为保漕运畅通,明清政府往往会牺牲农业灌溉以济运。如吴琦论述清代在保证漕运畅通的前提下如何均衡山东地区漕运与民田灌溉在水资源合理利用与分配中的利益^⑥。任重在研究明代“治黄保漕”政策的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上,分析该政策对徐州、淮阴地区农业生产的制约作用,指出“治黄保漕”政策具有极大片面性^⑦。其次,明清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治水政策致使农田被淹、耕地大量减少,甚至造成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如李德楠、胡克诚通过对南四湖“沉粮地”的考察,揭示了沉粮地的形成与黄运地区水环境变迁、国家漕运政策等具有很大关系,进而导致了该区域从耕地景观到湖泊景观的演变^⑧。卢勇、王思明对江苏兴化里下河地区一种独特的土地利用方式——垛田的产生时间及原因作了探讨,指出明代“束水攻沙”治水方针的实施是垛田形成的重要原因^⑨。

水利乃农业之命脉,其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各种灾害面前,大运河沿岸的先民们因地制宜、趋利避害,创造出了独特的农业生产模式,也总结了一整套的农业生产经验。因而对于大运河与农业生产关系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对于促进当下大运河沿岸农业可持续发展、弘扬我国优秀传统农业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意义重大。

① 马俊亚:《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② 王聪明、温瑞:《利害相生:明代黄淮水患与淮安府的城市变迁》,《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③ 夏锦文:《以系统思维“三位一体”建设大运河文化带》,《群众网》2018年6月15日。

④ 张照东:《清代漕运与南北物资交流》,《清史研究》1992年第3期。

⑤ 陈冬生:《明清山东运河地区经济作物种植发展述论——以棉花、烟草、果木的经营为例》,《东岳论丛》1998年第1期。

⑥ 吴琦、杨露春:《保水济运与民田灌溉——利益冲突下的清代山东漕河水利之争》,《东岳论丛》2009年第2期。

⑦ 任重:《明代治黄保漕对徐淮农业的制约作用》,《中国农史》1995年第2期。

⑧ 李德楠、胡克诚:《从良田到泽薮:南四湖“沉粮地”的历史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4辑。

⑨ 卢勇:《兴化垛田的历史渊源与保护传承》,《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六) 大运河文化研究

大运河川流不息已千年有余,沿途两岸早已深受运河影响,这种影响潜移默化、经久不衰,并形成了独特的大运河文化。早在20世纪90年代,便有学者指出大运河同长城一样也是文物,也需受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的认可与保护^①。此后随着运河申遗成功以及“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更是掀起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与研究的热潮,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大运河文化研究机构,对于大运河文化的研究亦是如火如荼。

山东大学运河文化课题组的《运河文化论纲》对运河文化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论述^②。安作璋的《中国运河文化史》洋洋洒洒百万余言,是一部较为系统全面研究运河文化的专著^③。路璐、王思明从时间、空间、主体三个方面对“大运河文化的流动性”这一概念进行了解析^④。此外,诸多学者也对大运河文化的相关专题作了一些深入探讨,主要涉及文学艺术、民俗信仰、社会风气等。如赵维平认为明清小说的主体是运河流域小说,并探讨了明清小说总体成就体现如此依赖大运河的原因,可以说运河文化孕育了明清小说的同时,明清小说也光大了运河文化^⑤。胡梦飞分析了运河沿岸苏北地区水神信仰兴起的背景、水神种类、水神信仰的功能及影响,认为这种信仰丰富了苏北地区民间信仰的内容^⑥。张小也通过对清代漕讼加以分析,总结了健讼之人在公共事物中的双重身份,指出这是中国传统法文化、清代政治与社会结构共同造就的风俗^⑦。

大运河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被誉为“中国第一历史文化名河”,对大运河文化的研究对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树立民族自信心具有重大意义。虽然在短短二十多年间大运河文化研究取得的成果颇为丰硕,涉及文学艺术、水神信仰、风气习俗等多方面,但是由于时代和专业的限制,对于大运河文化的含义及范围却没有一个明确界定,讨论的主题亦是庞杂而分散,未成系统,这也是今后研究工作需要重点解决之处。

回顾整个20世纪以来大运河水利史的研究,可以发现学界对于大运河水利史的研究由点到面,从零散到系统,范围已极为广泛,涉及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生态环境、科学技术等多方面,限于篇幅,本文未能一一点出,疏漏在所难免。在2014年大运河成功申遗及习总书记“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构想提出后,学界逐渐开始关注如何让大运河更好地服务于当今社会,对大运河现实性的研究方兴未艾,也将大运河水利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三、大运河水利史研究困境与展望

在一个多世纪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大运河水利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研究者必须在研究深度、内涵、路径上有更为严谨的思考^⑧,也亟待着研究路径与研究范式的突破。

(一) 多元的史料搜集与深层的文本阐释

① 梁白泉:《初论运河文化》,《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

② 山东大学《运河文化研究》课题组:《运河文化论纲》,《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

③ 安作璋:《中国运河文化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

④ 路璐、王思明:《准确理解大运河文化的流动性》,《中国江苏网》2019年2月12日。

⑤ 赵维平:《明清小说与运河文化》,《江海学刊》2008年第3期。

⑥ 胡梦飞:《明清时期苏北地区水神信仰的历史考察——以运河沿线区域为中心》,《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⑦ 张小也:《健讼之人与地方公共事务——以清代漕讼为中心》,《清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⑧ 闵祥鹏:《回归灾害本位与历史问题:中古灾害史研究的范式转变与路径突破》,《史学月刊》2018年第4期。

史学就是史料学。大运河水利史的研究离不开历史文献,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文献主要指古籍文献,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文献的定义变得更加宽泛,一切记录有知识的考古遗址、碑石、地图等皆属历史文献的范畴。对历史文献的搜集和梳理,是大运河水利史研究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首先,就古籍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来说,还有待深入。大运河古籍文献资料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但与黄河、淮河等的资料汇编相比,大运河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明显滞后,目前主要有朱偰的《中国运河史料选辑》、周魁一等编著的《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张芳的《二十五史水利资料综汇》和王云主编的《中国京杭大运河历史文献集成》等。但是关于大运河的古籍文献资料浩如烟海,许多散见于地方志、档案、奏疏或其它水利专著之中,如武同举的《淮系年表》、刘天和的《问水集》等历代水利专著却未受到足够重视,许多甚至尚未点校出版。这不仅严重制约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和研究水平的持续提高,也影响到社会各界对大运河历史发展和现实作用的了解与认知。

其次,就资料的运用来说,更多地局限于古籍文献,忽视了碑刻、地图、考古遗址等价值极高的一手资料。这些资料具有古籍文献资料无法替代的价值,加以运用有助于弥补既往研究中偏重于文字资料、忽视图像和实物资料的不足。有鉴于此,当前学界已有部分学者开始意识到这些资料的重要性并加以运用,相关研究先后问世,如连小刚、霍强的《镇江两方与江南运河商运有关的碑刻研究》对镇江市出土的与江南运河商运有关的两方清代示禁碑刻进行了释读与研究^①;尹学梅的《天津博物馆藏〈清代乾隆漕运图〉》对《清代乾隆漕运图》的基本情况和绘制时间进行了考证与介绍等^②。但较之其它史学领域之研究,仍相形见绌。

概之,在今后对大运河水利史的研究中,首先应当运用文献学、考据学等专业知识,对大运河的各类文献、考古遗址、碑刻等资料进行汇集、校注与整理,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大运河史料数据库。这不仅为大运河的学术研究提供基础,也能抢救文化遗存,为大运河的保护与利用提供历史资料的支撑。其次,在做好资料汇编的基础上,依旧要以古籍文献为主体,辅以碑刻、地图、考古遗址等资料,充分发掘这些资料的价值,二者相辅相成,从而实现从文字到图像、实物的互证。

(二)确立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实证研究范式

当下,国内对大运河水利史的研究仍以传统的定性分析为主,但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单一的定性分析早已无法满足当前研究工作的需要,此时我们便需要借助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来拓宽大运河水利史研究的思路。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便已有一些历史学家开始将定量分析引入历史研究,通过搜集大量统计数据来解决历史学中的一些问题。由生物学转向历史学的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曾指出:“科学的历史是有说服力的。一门学科通常只有创造出数学理论,才是成熟的。”^③最经典的当属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和斯坦利·恩格尔曼(Stanley Engerman)合著的《十字架上的岁月》,该书汇集整理了大量数据并加以计算来对黑人奴隶制做一个尽可能科学的描述与分析,为计量史学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当前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初步尝试运用经济学中的量化分析来解决历史学中的问题,如高元杰的《环境史视野下清代河工用秸影响研究》以清代黄运地区为中心,对地方志、水利专著、《清实录》等各类资料中关于清代河工物料的数据资料加以整理,以考察河工物料的演变与区域生态环境变迁的关系及影响^④;卢勇、余加红的《明末黄河中下游水利衰败与社会变迁(1573-1644)》在梳理地方志的明末黄河中下游水灾、人口、耕地面积数据的基础上,运用经济学中的相关性分析以量化黄河水灾所造成的影

① 连小刚、霍强:《镇江两方与江南运河商运有关的碑刻研究》,《苏州科技学院(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② 尹学梅:《天津博物馆藏〈清代乾隆漕运图〉》,《历史档案》2015年第2期。

③ [美]伊恩·莫里斯:《文明的度量: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李阳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6页。

④ 高元杰:《环境史视野下清代河工用秸影响研究》,《史学月刊》2019年第2期。

响^①。而对于大运河水利史的研究,同样也可运用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将大运河对城镇变迁、对农业的影响等量化展现,将研究建立于扎实的数据统计、分析之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组合运用,是今后大运河水利史研究需要深化的一个方向。

(三)开拓比较史学研究的新思路

随着西方史学范式的传入,中国史学的研究焕然一新,比较史学这一历史学研究方法在大运河水利史的研究中也逐渐“崭露头角”。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学术界便已掀起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热潮。“现代比较史学之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提出:“比较就是在一个或数个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选择两种或数种一眼就能看出它们之间的某些类似之处的现象……揭示它们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对这些相似点和不同点做出解释。”^②在历史研究中,通过比较,学者们可以更为清晰地找到并展示历史发展的相似性及差异性,这种比较往往也是一面进行自我审视的绝佳镜子。

对于大运河水利史的对比研究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路径:其一便是与国内其它河流的比较研究。我国河流众多、源远流长,水系类型多样,径流地区地理差异显著、文化迥异。当前国内已有一些学者对国内河流的比较研究作了相关尝试,如王进的《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之比较》从文化角度将长江与黄河进行比较,指出把握二者的差别与特点,对于重构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③。将大运河与国内其它河流比较研究,以此发现二者发展的共同规律及各自发展的特殊性,从而探寻大运河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优势与劣势,这对今后大运河的发展与保护意义重大。其二则是与国外河流的比较研究。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外交流将更加密切,而大运河与国外河流的对比研究更是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梁,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重大。2017年在复旦大学举办的长江与莱茵河历史文化比较中外学者交流活动,成功开启了中欧河流对比研究的新领域。国内一些学者也作了相关尝试,如樊志民从地理学的角度将四大文明古国的河流进行对比,从河流的流向来探讨中华文明经久不衰的原因^④,令人耳目一新、印象深刻。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大运河水利史的研究方法必须要不断推陈出新,与国际接轨才能与时俱进。其三也可对大运河的变迁史进行纵向比较研究,即将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大运河与今天的大运河进行比较研究,包括从古至今大运河沿岸城市的兴衰沉浮、大运河自身功能的变化、大运河治理方式的转变。如季鹏论述了隋唐至宋代“东南一大都会”扬州的繁荣至沉寂的变迁过程,并探讨造成这一变迁的原因,指出近代城市的发展必须要有工业化的支撑才能更加持久、稳定^⑤。无论是横向对比,或是纵向对比,都能从不同视角探索大运河的历史意义,也能深化大运河保护与研究的当前价值,如此才能更好地认识大运河的历史发展过程,揭示其发展规律。

(四)辩证统一的整体视域解读运河与内陆之关系

如果说长江和黄河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摇篮,那大运河便是中华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纽带。作为“活着的、流动着的人类遗产”,从古至今,大运河都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但当下学界对其认识仍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一方面,大运河申遗成功后,大部分学者对大运河的研究更多地是将视角集中于其创造的价值、重要功能,而未能辩证地分析其在历史上所造成的危害,客观性有所不足。大运河是元明清政府专为漕运而修建的,在维护王朝统一之时也不免积弊丛生。第一,与农争水而侵农。山东地势较高,为维持运河水位水量以保证漕粮正常通过,便规定“灌田者不得与转漕争利”^⑥,时常牺牲农业用水、甚至引用百姓

① 卢勇、余加红:《明末黄河中下游水利衰败与社会变迁(1573-1644)》,《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② 庞卓恒:《比较史学》,中国文化书院,1986年,第461页。

③ 王进:《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之比较》,《社会科学动态》1997年第11期。

④ 樊志民:《学习强国》,《每日一星》,2019年8月7日。

⑤ 季鹏:《地理环境变迁与城市近代化——明清以来扬州城市兴衰的思考》,《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12期。

⑥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72《职官一》,中华书局,2000年,第1175页。

生活饮用之山泉水,这严重影响了山东地区的农业生产。第二,以田庐为壑而伤农。为保全运道,一遇黄河泛滥封建统治者便肆意分洪,给多地乃至整个运河沿线造成了严重的水灾,苏北、淮北成为被牺牲的局部,更是不争的事实。第三,苛政猛于虎而害农。早在唐代,诗人李敬芳的《汴河直进船》形容运河时就曾评述道:“汴河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膏脂是此河。”元明清时期东南地区为主要纳漕区域,在极重的纳漕负担下,饿殍千里、人烟断绝的惨景时有发生。如今大运河江苏段仍旧畅通,山东段、河北段运道早已淤废,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因此,有些学者提出要全面恢复大运河是不切实际的。葛剑雄在其文章《大运河历史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刍议》中也提到当前地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应当实事求是探寻大运河的历史,不能夸大和任意想象,而应祛芜取精地对其进行辩证分析,抛弃糟粕,弘扬精华,方能创新广大并传之久远^①。

另一方面,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想要了解当今世界的发展格局及未来世界的走向,就必须了解历史的走向。大运河水利史的研究不仅仅是为厘清这条河的相关问题,更应着眼宏大,将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将运河与内陆联系起来,从整体视域的高度去解读大运河。美国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便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榜样,在其著作中尤为关注黄、运两条水道所交汇的腹地,在大运河的繁华时期,可谓“京师咽喉”,随着漕运衰败,这些地方逐渐被边缘化。他给予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去认识这块近现代时期一直被忽视的内陆地区,去了解这块地区落后于沿海地区的重要原因^②。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故事,更多的是经验教训。“躲进小楼成一统”这种只为研究而研究的模式早已过时,大运河水利史的研究更应立足当下,着眼未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资借鉴,提醒人们在对大运河进行保护开发时要客观辩证地进行审视,切记拍脑袋决策和搞面子工程,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综上,当前“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方兴未艾,大运河水利史研究是大运河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亦是大运河保护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通过系统梳理、分析大运河水利史学术研究的历程和研究内容,不仅能为研究大运河水利史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视角和研究思路,也能为继续探讨大运河文化带的开发与建设、治理与保护提供些许借鉴。大运河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千百年来,大运河既哺育了沿岸人民,也为他们带去了诸多苦难,在未来大运河水利史的研究过程中,应坚持以人水相谐的运河整体生态观为核心,从人与运河的整体演化中,分析河流的生态属性、人文价值与社会功能;从中国传统社会内核里,历史研究的视角中,探讨河道治理、商帮模式、漕运兴废、河流修复、水体流通、生态涵养等新时期人一水互动的治理模式、生态意识与文化形态。激发古老水系的文化价值、经济活力,辐射带动运河水系内外的经贸往来,将运河建设成为传统市镇贸易与经济引擎、南北文化交流的纽带、生态水系建设的典范、人水和谐的生态廊道,唯如此,“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才能指日可待。

[参 考 文 献]

- [1] 高元杰. 20世纪80年代以来漕运史研究综述[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15, (1).
- [2] 马俊亚. 被牺牲的“局部”: 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3] 葛剑雄. 大运河历史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刍议[J]. 江苏社会科学, 2018, (2).
- [4] [美]彭慕兰. 腹地的构建: 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M]. 马俊亚,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① 葛剑雄:《大运河历史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刍议》,《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② [美]彭慕兰:《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马俊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